

名人笔下的钱玄同



疑古先生

走近二十世纪文化名人丛书

高勤丽 编

东方出版中心

钱玄同笔下的

名人

K425
G761
疑古先生

名人笔下的钱玄同
钱玄同笔下的名人

上
篇

名人笔下的钱玄同

钱玄同先生传

黎锦熙

先生姓钱，名夏，玄同以字行，晚复名夏；少字德潜，改掇猷；号疑古，晚号逸谷，一署逸叟。浙江吴兴人，清籍隶湖州府归安县。父振常，清同治间举人，年六十二始生先生。兄恂，清末任驻日本及法意等国使馆参赞及公使，长于先生三十四岁，先生与侄稻孙年相若也。幼岐嶷而谨愿。六岁，从塾师读经，老父因其兄不第，故属望殷，督责严；父没，随兄幕游，仍延师课读。年十六，丧母。聘徐氏，弱冠兄为成婚；赴日本留学，习师范，因从章氏炳麟专治国故，精文字音韵之学，又得与革命党人往还。宣统间，归国，任教员浙中。民国元年，任浙江教育司科员视学职。二年，赴北平，任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附属中学校国文教员，旋兼教授国立北京大学。六年，投稿《新青年》杂志，赞倡“文学革命”，并入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为

会员。七年，轮任《新青年》编辑人，鼓吹“新文学”及“新文化运动”最力；又与国语研究会诸人致力“国语运动”。八年，“五四”运动起，先生言论丰采，震烁一时。是年兼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常驻干事，自是于国语、国音、注音符号、国语罗马字、简体字等制作推行，悉心参划，亘二十年，其效甚溥；十七年，教育部改常驻干事称常务委员，并于会中设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廿四年，复改会名为国语推行委员会，先生始终任其职。先生教授北平公私立各大学，以音韵学为主，本其师传，复运以科学方法，参以新获材料，卓然成当代大师。十二年，北京高师改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十七年，北京改为北平，先生任国文系主任教授，兼授说文研究，经学史略，周至唐及清代思想概要，先秦古书真伪略说诸科目，皆能以历史眼光，整理，评判，以求真为主，力矫从来“泥古”与近今“蔑古”之弊。二十三年，因积劳患血管硬化症，复感国难，神经极度衰弱；二十六年，卢沟桥事变起，北平旋陷于敌，国立诸学府皆南迁，先生蛰居养病，拒绝伪聘，二十八年1月，病没于医院，年五十二。先生术业专一而识解宏通，议论激昂而持躬谨介。著有《文字学音篇》、《音韵学》及《国音沿革讲义》，并论文、杂说、函牍若干篇行于世。子三：长秉雄，国立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任私立北平孔德中学教职；次三强，留学法国，习理科；幼德充，孔德中学高中部毕业。

上“传”之首章，盖近于从前“宣付国史馆立传”的体裁，把它当作全传的纲领，详开履历，带叙家世，概述事迹，略下评语，如是而已，殊不足以见钱先生的精神。先生长子秉雄君3月间来信云：“日前见知堂先生，谈及先父传记事，他说：最好请先父生前的朋友各就所知写一篇文章，将来再汇编在一起，

这样,可以看出先父一生的种种事迹,免得因传记结构体裁的关系而删去一部分。我很同意他这办法。先生知先父事甚详,请写一篇!”只可惜我三十多年的日记都留置北平,因为那里头实在兼有钱先生二十年来的“起居注”,幸亏前年离平时把《国语周刊》合订本第二册以下都带出来了,加以《国语运动史纲》这部书中也包含着他的大部分的历史,再参以此间可以觅得之关于“新文学”等等的书,勉强算有些零碎的材料;然后凭我个人约略的回忆,与忠实的感想,信笔所之,夹叙夹议,逐类成章,连枝作注。(大体上可分为八章:一、“国语运动”的二十年经过;二、逝世时情形;三、生活概况;四、“文学革命运动”及其文学;五、“新文化运动”及其操行;六、治学方法及其国故之学;七、文字音韵学;八、思想及人生观。)其中年月偶忘,事实有误,著录未尽,评论或乖,无法稽询,定所不免,统俟异日,重为订补。

我认得钱玄同先生,记得是民国六年,他正 30 岁,我 27 岁。(因为我的日记不在手头,初次晤面究竟是在何年何月何日何时,须等打回北平后,再行查明补入。)会面的地点是在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第一次大会的会场,这个会是民五我们几个“教育部的老爷们”(胡适先生语)发起组织的,正会长是蔡元培先生,副会长是张一麀先生(详见《国语运动史纲》页 66)。钱先生于民国二年来北平,就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民十二改师范大学)和附属中学教国文,后来又受北京大学聘,看见了胡以鲁先生(即《国语学草创》的著者)教的是一门“国语学”,大怒,说:“‘国语’成什么名词?‘国语学’算什么功课?”可是民六他却加入这个国语研究会为会员了。当时我和他不过一面之缘,到了民国七年,我从武昌高师讲演回来,印了一本《国语学讲义》,钱先生看见了才初次和我长谈,讨论这

名人笔下的钱玄同 钱玄同笔下的名人

本讲义和《新青年》里头的许多问题。(但我那时候并不知道钱玄同就是钱夏,因此闹了个笑话:这年有湖南同乡符(定一)、易(克臬)两先生和我相约发愤研究《说文》,说,非从古音韵学入手不可,打听在北京的有一位钱夏先生,浙江吴兴人,得章太炎之真传,而且能综合顾(炎武)、江(永)、孔(广森)、段(玉裁)、戴(震)、严(可均)诸家之长,所得超过于其师,可是崖岸甚高,脾气颇大,若要拜他做老师,非具备红纸门生帖子,正式“拜门”,并奉“贽敬”数百元不可,我们三人各凑上两百元吧。我当时颇惜钱,又觉得这个办法太旧式了,就说:“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语见《孟子》)事遂作罢。不久他们二位也得到两大本北大油印的《音韵学讲义》,上署“钱玄同编”,说这个人就是钱夏,我还不大相信,说“钱玄同就是钱夏!不大像吧!”随后问他自己,才算证实。事隔十五年,到民二十三,我才介绍钱先生和符先生见面,以后时有过从,讨论音韵,因为符先生此时正在专力编《联绵字典》,提要见《史纲》页333。)钱先生于诸问题中,尤注意创编国语教科书。那时全国小学儿童用的教科书都是文言文,“国语科”还是“国文科”,教育界的人们,大家还不相信白话文真有一天能够当教科书读的;第一次破天荒开国语教科书编辑会议,是民国七年的事,地点是厂甸北京高师校长楼上,主席是陈宝泉先生,我们公推钱先生担任编辑主任,打算编成了就在高师附小实验。这件事,是中国创编“国语”教科书之始。(这部教科书,他虽终于没有编得出来,但孔德小学也在那时改用国语教科书,头两册就是钱先生亲自写的石印本。)次年,民八,教育部的国语统一筹备会成立;“五四”运动也是这年起的;民九,1月,教育部就把小学“国文科”明令改为“国语科”了(详见《史纲》页107)。

民国七年11月23日,教育部正式公布注音字母。同时

要把普通用字的国音注定公布,这件事,问题很多。也就在民七的冬天,吴稚晖(敬恒)先生从上海带着他亲自编写的《国音字典》稿本来北平,共有一万三千多字,是根据着民国二年教育部读音统一会全国代表和专家多数表决的字音规定的;当时陈颂平(懋治)先生受了教育当局的嘱托,邀集钱吴两先生和我,还有王蕴山(璞)、马幼渔(裕藻)两先生,在他家里开审查会,两夕会餐(每餐净吃两个素火锅),就修正决定了。这是中国确立国语字音标准之始。这审查的两夕,只是钱先生和吴先生辩论,钱先生在当时所编的《音韵学讲义》中,还大大的批评注音字母诸多不好,现在通行的《文字学音篇》,就是他唯一的一部专书遗著,后面也还留着些痕迹呢,可是当时两夕的会议,他虽觉得有些字音规定得太俗而不合于古,但极肯降心相从,不执己见,所以能顺利而迅速的通过。次年,民八,《国音字典》出版,东南方面的教育界大哗,说《国音字典》不应该用多数表决之普通字音,应该一律准照北京本地人说话的字音,这叫做“京音国音两派之争”。我去江浙踏勘一趟回来,意颇活动,钱先生坚持不可变更原则,只可逐字复审,稍加修订,所以《国音字典》到民国九年12月24日才由教育部正式公布。(详见《史纲》页95。)从此《国音字典》做了全国文字读音的标准凡12年,直到民国二十一年才正式废止,另由教育部公布《国音常用字汇》。这部《国音常用字汇》,却是完全改用北平本地人说话的字音为标准,比民九公布的《国音字典》,更俗而不合于古了!这个转变,钱先生也是一个关键:大约是民国十年(待查日记)夏天,他在我家院子里乘凉,讨论当时小学生照多数表决公定的所谓“国音”读国语教科书,在全国任何地方都觉得有些别扭,听着不是味儿,究竟要怎么办才好。他说:“前几天我给叔平(即马衡先生)家里的小学生写刻墨盒盖

儿,用注音字母拼写‘国音’墨盒两个字,小孩子都说拼错了,跟口里说的‘墨盒’不对;叔平也说这两个字的韵母恰巧要调换个儿(因当时公定的‘国音’是作ㄇㄛˊㄉㄜˊ,而北京实际的读音是ㄇㄛˊㄉㄜˊ也);我原是反对‘京音派’的,现在成了人格问题,要毅然决然,明白宣布,就采用‘京音派’的主张,把北京的地方音做国音,你以为如何?”我答道:“先生!一个墨盒,你于‘言下大悟’了!(禅门语)”从此国语运动的语音标准问题,才确定了一条合理而有效的路线。这又可见钱先生实事求是,不护己见的精神。民十二,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以下简称国语会)第五次常年大会,就组织了一个“《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到民十四,才由这委员会推举钱先生和我并王璞、赵元任、汪怡、白镇瀛(即白涤洲)诸位共六人为起草委员,逐字逐音,逐日会议,到民十五才草成 12 大册稿本;民十七,钱先生以为字数太多,有些不常用的字,其音一时难于决定,民十八,国语委员会(民十七,教育部于“国语统一筹备”下加“委员”二字;这也是简称)第二次常务委员会议决改名《国音常用字汇》,就原稿本删定,计得 9 920 字。加上异体异音的,合计 12 220 字。再由钱先生作最后的审核,我和白涤洲先生随时参加意见,直到民二十“九一八”事变起时,全稿始定。民国二十一年 5 月 7 日,教育部正式公布《国音常用字汇》,同时废止民九公布的《国音字典》。这部《国音常用字汇》,从民十二到民二十一,整整的经过十年才成功,可以说是钱先生一手编定的。(卷首有一长篇例言,题为“本书的说明”也是钱先生一手做成的,这篇东西是他近年最精细,简明,切实之作,不可忽视;详见《史纲》页 171、262。他还有一篇《国音略说》,也是要附在这《国音常用字汇》卷尾的,可惜没有做成,只发表了一段《“币”韵的说明》在我和白涤洲先生编的《佩文新韵》中,并见

《国语周刊》150期。他近年关于注音符号的论著，还有《十八年来注音符号变迁的说明》，见《国语周刊》第1、2两期，《国音声符略说》，见《语周》37期，可以和他早年《论注音字母》一文对着看，文见《新青年》4卷2、3两期。）这些都是后话，提叙于此，仍说民国七年。

民七的两件大事：创编白话的国语教科书；创修注音字母。注定读音的《国音字典》：乃是民八“五四”运动以前，钱先生以生力军参加的“国语运动”。《新青年》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也是同时兴起的。钱先生也是健将。因此，这两大运动，就自然联络起来，团结一致。到了民八“五四”运动起，影响政治，新的潮流在社会、教育、思想、学艺上，都添加了很伟大的势力，所以国语运动的两件事，就很不费力的在教育法令上成功了革新的规定。（这两件事的历史价值，《史纲·序》〔页84〕云：“民七公布了注音字母，民八令颁了《国音字典》，实行‘国语统一’的政策，恰与2200年前秦始皇的‘国字统一’政策远远相承；……民九明令废止了全国小学的古体文而改用‘语体文’把科目的国文改为‘国语’，是‘文学革命’的实施，恰与2100年前汉武帝的‘文体复古’政策遥遥相对。”）但是这都不算什么，国语运动最高的企图，最终的目的，乃是建设中国的新文字。钱先生对于此事的最大努力，是在民十以后，民廿三以前。我和他论交至今共计有23年，互相期许的中心事业，还不在民八前后这几件侥幸火速成功的事情上头，不过这几件事也是新时代的沮诵、仓颉的勾当中，应该具备的历史条件而已。^①（此为本文文末诗注号码，共22处，下同——编者注）

钱先生主张中国的新文字制定之后，只须用法令公布，不要藉政治的力量来推行，因为这是学术问题，应该自由研究；

名人笔下的钱玄同
钱玄同笔下的名人

秦皇汉武那种强制的办法就根本不对。我说研究尽管研究，但若要使新文字能够普遍的应用，总须有政治的力量才推得动，例如土耳其（略见《史纲》页182）。他不以为然，笑说：“看你何时做凯末尔！”^②

中国的新文字，为什么一定要用拼音制，而拼音制又为什么一定要采用罗马字母呢？钱先生说这是二百几十年前明末大学者刘献廷（继庄）先生的主张，刘氏生于1648（明永历二年，清顺治五年），他要把这一年定为“国语纪元”，将来到了1948（民国三十七年），应该给刘氏作一个300年纪念；他18岁时，曾改号“德潜”为“掇献”，谓欲掇拾刘献廷之坠绪，吴兴语“德”与“掇”同音，“潜”与“献”亦音近也。（民二十二，他又把“疑古玄同”改为“掇献玄同”，有《与黎锦熙、罗常培书》自道其详，见《史纲》页4；罗先生有《刘继庄的音韵学》，见《语周》第32至34期。）民国十一年，钱先生和我在西单牌楼一家小羊肉馆雨花春楼上，共同决定，开始放一大炮，在当时的《国语月刊》里发刊一大册《汉字改革号》，除各同志都精写一篇论文外，并把历年讨论这个问题的文字都综合起来，他写首篇，题为《汉字革命！》那年我们才把中国的新文字定名为“国语罗马字”。（钱先生的《汉字革命》是他一篇斟酌饱满的长文；他在民七，已有这种主张，如《新青年》4卷4期的《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5卷5期的《汉文革命之讨论》及6期之讨论《罗马字与新青年》等。）次年民十二，钱先生在教育部国语会第五次常年大会，提出请组织“国语罗马字”委员会的议案，议决通过，照章由主席指定会员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周辨明、林玉堂（后改名语堂）、汪怡等共11人为委员。从此以后，我们平时多半是研究这些问题，一会面也就是讨论这个问题。到民十四，刘半农（复）先生从欧洲回国，发起一个“数人会”，专

谈语言音韵之学，每周聚餐，轮流主席，不久他又回南去了，钱先生主张就藉着“数人会”之便，专议“国语罗马字”问题，由赵元任先生主稿，从十四年9月到十五年9月，开会一年，最后还有几点，“数人”争执，只好票决，服从多数。公布的布告中说：“该委员会成立迄今，已逾两载，其间搜罗材料，调查实况，凡现行制之缺点，新定制之较量，专家意见则广事征求，国外学者亦通函讨论，计开会二十余次，参稽试验，稿凡九易，乃于本年9月14日召集全体委员，正式通过。”盖纪实也。但是当时北洋军阀专政，凡事都“开倒车”，因之教育部当局不肯用部令公布。（恰巧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主讲的梁任公先生启超，是教育部当局的老师，梁先生素来也是赞成罗马字母拼汉语字音的，就公请他去一说，但也无效。）大家正没办法，钱先生想得一计：不必用正式部令，就以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名义直接布告，把“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正式公布，此民国十五年11月9日事也。（详《史纲》页157。）直到民国十七年9月2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的前身中华民国大学院，才正式公布“国语罗马字”，所以“国语罗马字”是经过两次公布的。（那时钱先生很有几篇关于“国语罗马字”的重要论文，如《为什么要提倡国语罗马字？》、《历史的汉字改革论》、《Gwoyeu Romatzyh的字母和声调拼法条例》、《关于国语罗马字字母的选用及其他》，都发表在民十六的《新生周刊》，最后一篇更重要，故民二十四重登于《语周》231至234期。那时的《语丝》59期也有他一篇《国语罗马字》。）民十七的冬天，北平大学区成立，电中央问“北平”二字的译音，那时大学院已仍改称教育部，回电中所定拼法与“国语罗马字”不合，钱先生大为愤激，就写了一封长信给教育当局，说：“罗马字母，在学术上、文化上，早成为世界公用的字母，流俗称为“英文字母”，实在是大

笑话。……用世界公用的罗马字母，制定中国国民的读法拼法，把本国的名称写成拼音文字的形式，其事尤为切要，此与另译英文名称，用意全然相反。”（全文见《史纲》页183。）“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即26个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法），简名GR（即国罗两字的首一字母），这是把本国文字所用的符号，因利乘便就“国际化”起来。反对的人总以为这是用洋文，钱先生驳斥说：“这就同五十年前的学究们看见数目字用1、2、3、……就骂为吃洋教的一样。”文字改革的长远策略，就是要利用世界较通行的字母，来给本国的语言和教育服务，同时也有利于中外文化的交流，这是“吞洋”而不是为洋所吞也。（钱先生对于“世界语”即Esperanto，也有相当的研究，民七八，在《新青年》中很加提倡，如3卷4期；4卷2期、4期；5卷3期、5期；6卷1期、2期，都有他与人论“世界语”的文字，这原是抱有世界大同之理想而改革文字之一种“急进派”的主张，见《史纲》页159。但民九以后，他就觉得这种理想太高，现代的中国，只能提倡国语，而改革传达国语的文字工具使之“世界化”，故专心致力于“国语罗马字”了。）^③

1931年“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也制定了，在知识青年中推行甚力；钱先生认为太简单了（因为它废止四声，又不要统一的北平标准音），比方为南北朝乐府中的《敕勒歌》（原歌辞七句只有廿七个字），像这样的拼音法，实不足以代表汉字。^④他对于厦门大学教授周辨明的QR（也是国罗两字的首一字母）又认为太复杂了（因为它包括了方言字母的拼音法），虽费了精神结构，但不便于实际推行，终将成为海市蜃楼的。^⑤1934年，上海“大众语”论争起，牵涉到文字改革问题，钱先生拒绝参加；他批评我专从文字改革的计划和技术上来辩论是“驴唇不对马嘴”，他说他已“鸣金收军”了。我说：那么就一同

“坚壁清野”吧！（所以民二十四，我《答复济南青年社书》，便宣布“坚壁清野”政策，见《语周》228 及 229 期。但 GR 的同志们，还有努力推行并实验的，如黄学周先生于民二十三在郑州发起的“国语罗马字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如王玉川先生于民二十四在山东民教馆制定的《新文字推行计划大纲》与萧家霖先生在山东平原县的《新文字实验报告》，见《语周》204、261 及 262 期；也有主张接受“拉丁化”方面的妥协条件，想共同进行文字改革事业的。钱先生对于后者极端反对，说：“若果如此，就连国语罗马字一并牺牲！”我最后的评判，是认“拉丁化”也可以做汉字注音的一种别体符号，但不配做独立的新文字，把它列为 330 年来用罗马字母拼注汉音的 29 家之一，说见《国语周刊》236 期；但钱先生还“期期以为不可”，说：“总不要理它！”）^⑥

民二十三的“坚壁清野”的政策既定，钱先生和我就约定暂不鼓吹 GR，共同努力于现阶段的急切有效的工作，“事求可，功求成”，他担任汉字的“简体字”，我担任“注音汉字”，他以为这两件事，如车之有两轮，推进教育，“唤起民众”，必从肃清文盲做起。^⑦

当民二十二“大众语”论战初发生时，附带着有一种“手头字”运动。钱先生认为这是可以提倡的，但绝对不可用“手头字”这个名称，仍旧要叫“简体字”。他曾于民十一在教育部国语会第四次常委大会提了一个“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是一篇又痛快又充实的文章，当时议决通过，也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他是首席委员。（详见《史纲序》页 29，原案也曾登《新青年》7 卷 3 期。）但以后大家都去干 GR 去了，没有注意这件事。事隔十余年，到民二十三，上海印刷界居然铸造了几百个所谓“手头字”印在《论语》和《文学》等等定期刊物里，他正在病假中，也就发愤动手搜集，以“述而不作”为主，想编成一部

名人笔下的钱玄同
钱玄同笔下的名人

《简体字谱》。又在民廿三国语委员会第廿九次常务委员会提出一个“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见《史纲》页281),同时我也提出一个“汉字注音铜模应由国家铸造推行案”,主张大小各号铅字,右旁应刻定注音符号,成为一体,不须另排,名曰“注音汉字”,钱先生以为这两件事互相关联,应该同时进行。当时议决通过,呈请教育部施行;民廿四,1月,教育部开会讨论,约我和汪怡先生到南京出席,钱先生送到东车站,亲手致一封长信给我们,信中条列采定简体字的具体办法(原信见《语周》第176期。大抵钱先生近年所作的文字,大部分都登在《国语周刊》,重要的就引入《史纲》,但《史纲》是民廿三出版的,所以民廿四以后的材料,只能单找《国语周刊》了)。部里对于这两件事都决定完全照办,“简体字谱”就委托钱先生起草;“注音汉字”则由我主选,一面委商承铸。到6月,钱先生的《第一批简体字表》起草告成,计2300余字(搜集经过,略具于他致王部长及致张司长两函中,见《语周》第191期),又由我和汪先生拿着赴南京出席教育部的简体字会议(我给添上《简体字之原则》及推行办法14条,又《关于简体字的各方面意见的报告》一通,钱先生又有《致黎、王书》一通,均见《语周》第204、205两期。这个会议,由社会司司长主席,又科长科员二人,普通司司长科长二人,国语委员会常委二人,中央研究院及国立编译馆各聘专家一人出席),讨论三日,通过1230余字;最后由部长圈定324字,于民国廿四年8月21日先行公布,是为《第一批简体字表》(钱先生的原草案有2300余字,这一公布的只得其尾数)。并公布《各省市教育行政机关推行部颁简体字办法》九条,其第7条云:“自廿五年7月起,各学校考试答案,部颁简体字,得一律适用”(部令全文及324个简体字表,均见《语周》第211、212两期)。这就是二十

年来国语运动中“简体字”运动的一段极简略的历史，也就是钱先生向来感到兴趣的而最近几年还在病中力疾从事的一种工作。（至于我所分担的“注音汉字”工作，钱先生虽也时常参加意见，但其经过情形及公布的 6 788 个注音汉字表，已详叙在《注音汉字》一书中，此不旁及。钱先生常和我讨论日本“レビ付”的办法和五号注音汉字，他的意见略具于我的《与钱玄同书》中，见《注音汉字》页 120。）^⑧

中国新文字的建设工作刚刚起首，何以忽又折转回来，专干“简体字”和“注音汉字”呢？固然“坚壁清野”是一时的政策，但也还有个历史的哲学基础。钱先生邃于《春秋》公羊之学，有时也把“三世”来推断当前的一切事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语），世界化的“国语罗马字”应该是“太平世”的初步；现在中国社会还离不了汉字的环境，总须就汉字加以形体的改良和声音的帮助，所以选定“简体字”和铸造“注音汉字”，普遍通行，才可了结这“升平世”之局。我在《大众语短论》中也曾宣布一个原则：“大众语所用的工具，第一，汉字改‘良’，用‘简体字’，这是过去残余阶段的补充工作；第二，汉字改‘换’，用‘注音符号’，这是现在过渡阶段的紧急工作；第三，汉字改‘革’，用‘国语罗马字’，这是将来必然阶段的准备工作。”并说三种工作，同时要做，其间看似矛盾，并无冲突，所谓“相反而实相成”，可是必须铸造了推动了“注音汉字”，才可以把这三阶段的进展，在现阶段实际工作上，所有一切的冲突、矛盾，统一起来。（详见《史纲序》页 28 至 61。）钱先生说：“你把我的简体字工作又降下去一级，未免对它‘彼哉彼哉’，简体字难道还是‘据乱世’的事情？”我说：“这三阶段的工作，都在‘升平世’的末期，所以同时要做；‘升平世’又分三阶段者，即公羊家所谓‘三世之中复有三世’也。”他道：“好！”